

# 臺灣的家庭研究：

## 從家庭戶組到家人關係

～ 華 英 章 ～

### 一、前言

近十年來臺灣有關家庭的研究，以家庭為主要關注點的研究，絕大部份是放在現代社會的變遷如何影響到家庭結構或家庭價值的變遷方面，同時也注意到傳統的中國家庭結構或價值，在這樣過程中的持續與變遷。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家庭一直被看作中國社會最主要的制度，因此關注台灣其他社會現象的研究時，家庭以及家庭所衍生出來的制度或價值，卻被視為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這是在一個有關台灣企業研究中，極其明顯的一個切入角色。就在整個社會變動的過程中，大家看到家庭的功能逐漸減少，但同時也看到家庭是影響個人生活，如社會階層的研究，家庭的傳承，一直是討論的重點的重要因素；同時家庭也是社會的整體運作所依賴的一個因子，如在整個福利制度的討論中，對家庭變遷的認知常是考慮的起點；而家庭的傳承功能，往往也被視為是可以運用的社會基礎。從這樣的兩個方向來探討家庭在現代台灣社會的結構位置，家庭可以看作是這個社會變遷所影響的微視因素，也可以被視為重要的制度，而影響到其他社會運作的因素。

從家庭出發，首先我們可以將家視為微視對象，家庭內成員所交錯而成的關係成為焦點，而整個社會的變遷，可以是影響家庭的微視現象。第二，家庭作為一種關係的組成，可以轉移到其他的社會事件或場域中，這是家庭做為一種微視現象對微視現象的影響。第三，家庭作為一種主要的社會制度，一方面對家內個人的日常行為有所影響，是家庭制度成為影響個人行為的微視現象。而以家庭對企業的影響，作為一種微視對微視影響的現象。基本上，是以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研究成果作為討論的對象。

## 二、家庭形式與家庭關係的變遷： 社會變遷的結果

### (一) 核心化與主幹化的爭議

自一九六〇年代之後，台灣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快速進行。許多社會學的研究，紛紛指出核心家庭比率增加的事實。所以各種調查的資料進行分析時，外省人的移入，城鄉間大量人口的移動（即都市化），都市居住環境的改變，從業與職業身分組成的變化，以及教育程度的提高等（Parish, 1987；謝高橋，1980：84-85；伊慶春，1985；徐良熙，1984；文崇一等，1989），都被視為影響核心家庭的重要因素。這些經驗研究，大致是以某一時點的調查為依據，試圖呈現各種變項與家庭形式比率的關聯。因此即使提出具統計顯著性的變項，容或有些差異，但都可以從工業化所造成的結果之脈絡下加以解釋。而在一些經驗的分析中顯示，台灣地區大部分的年老父母還是和一個已婚兒子住在一起。換言之，台灣地區的家庭，並未像人們所預期的那麼重複西方的核心模式（Freedman, et. al.）。賴澤涵與陳寬政則本諸Freedman等人台灣生育率調查的分析結果，指出：擴大家庭的比率遠小於主幹家庭，而主幹家庭所佔的戶數比率雖然不及核心家戶，但從父母的角度來看，七成父母仍與已婚子女同住（一九八〇）。根據這樣的數據，他們認為在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主要的家庭形態仍是主幹家戶之後，在一九八〇年代有關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結果亦呈現類似的結果（羅紀瓊，1985；陳肇男，1988）。

陳寬政與他的一些同事（陳寬政、王德睦、陳文玲，1986；王德睦、陳寬政，1987；陳寬政，1987；陳寬政、涂肇慶、林益厚，1989），進一步用人口轉型來說明核心家庭比率增加的現象。他們認為台灣在戰後核心家庭的

增加是人口轉型的過渡現象，純粹是父母與成年兒子數目比率變化所導致的結果。亦即，台灣經過日據時期死亡率率的長期降低，戰後每對年老父母的兒子數目增加。所在主幹家庭的形成過程中，既然每對老年夫婦只能與一位已婚兒子同住，於是就會形成了核心家庭比率相對上升的情況。換言之，由父母的角度加以分析，當子女數增加時，勢必會造成核心家庭比率的增加；若是子女數減少時，核心家庭的比率就會降低。因此，以人口轉型的概念為核心的研究者，認為戰後的家庭形式一直以主幹家庭為基礎，而家庭形式的比率變化則是反映人口轉型所導致的結果。王德睦與陳寬政（一九八八）明白指出，使用核心家庭比重（或家戶組成）來印證現代化與家庭變遷的關係時，不同時考慮人口變遷的影響則不可能取得正確的結論。

回顧人口轉型論者的研究報告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方法上對既有家庭形成變遷方面的研究加以批評，一方面突顯台灣家庭形式的持續性——即一直是主幹家庭為主導的結構。他們很直接的說，「人口轉型改變了家庭成員的代間人數分配，進而改變不同類型的家戶所佔的比重，但這些變化，都只是人口學中所謂『形式』關係的轉換，與家庭制度是不相干的。」（王德睦、陳寬政，1988）因此在針對現代化或工業化對核心家庭形式的影響方面，人口轉型論者基本上不支持此一論點且予以批駁。但是何以在社會急遽變遷下，主幹家庭繼續成為台灣家庭形式的一個重要成分，甚至是最主要的成分，人口轉型論者並未提出有力的解釋。在人口轉型論的挑戰之下，很直接的一個研究議題，或許不是解釋主幹家庭的持續，而是在整個社會的變遷脈絡下，家庭形式及其內容究竟有無明顯的變化了。

另一方面，面對轉型論的批評，主張家庭核心化的研究者，主要是從而已婚兒子的父母與兒子同住的比率不斷下降的事實來反駁。具體而言，從台灣省家計研究所歷年的生育率調查資料來看，排除了父母不在台灣和父母已歿的樣本之後，父母與已婚兒子同住的比率，在一九七三、一九八〇、一

九八六的三個年度，分別是七九·九六%、七五·九六%和六八·五六%，降低了十個百分點，甚至在只有一位已婚兒子以及有二位已婚兒子的樣本分析中，同住比率同樣降低十個百分點（齊力，1990b:35）。換言之，主張家庭核心化者，傾向於接受現代化對家庭形式可能造成的結構性影響。

除了由人口結構或社會變遷的因素考慮家庭核心化之外，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議題就是，歷史上台灣社會是否一向以主幹家庭為主。有關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庭結構，一般學者都同意，在社會經濟與人口條件的限制之下，所謂已婚兄弟與父母同住的大家庭，只是一種理想的型式，而在現實的社會之中，大多只能維持父母與一對已婚子女同住的主幹家庭型式。在這種大家庭的理想以及實際差距的互動之下，中國社會的家庭組成，各個地方因為社會經濟與人口條件的差異，顯示了相當的變異性。一項由Molih (1995) 和家計所生育率調查的分析數據（章英華、齊力，1991），顯示台灣社會在日據時期以及光復初期時，傳統中國社會少見的大家庭佔明顯的優勢，但是在戰後的四十年間，雖然死亡率依然下降，老年人口比率持續增加，整體的人口條件應有利於擴大家庭的形式，但是所呈現的反而擴大與聯合家庭比率的顯著下降。這意味所謂大家庭的理想已經式微，不會因為經濟條件的轉變以及平均壽命的提高而復振，這應該是台灣戰後家庭形式變遷的一個重要特色。

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隨著擴大家庭理想的消失，值得注意的就是家庭核心化與主幹化的過程同時存在，亦即核心家庭的存在並不完全是因為形成主幹家庭過程中分化的結果。依據家計所的資料，我們同樣也可以推估核心家庭是因為主幹化或核心化影響的比重（齊力，1990b）。以具體的數字來看，一九八六年時，有一個已婚兒子的父母與兒子同住的有三六八人，不同住的有二四五人。換言之，不與已婚兒子同住的父母與其已婚兒子應該共同形成四九〇（二四五×二）個核心家戶，這些都不是因為主幹化而分化出來的核心家戶。再其次，考慮有兩個以上已婚兒子的父母：(1)若以只有兩個兒

子來合計時，一四九四個與兒子同住者，可以形成一四九四個主幹家庭和一四九四個核心家庭；不與兒子同住者共六〇九人，可以形成一八二七個（六〇九×三）核心家庭。(2)若以三個兒子來估算，一四九四個主幹家庭之外，相應有二九八個另外兩個兒子組成的核心家庭，六〇九個不與兒子同住的父母，他們與三個兒子可以形成二四三六個（六〇九×四）核心家庭。若以一對夫婦能夠有三個已婚兒子當作偏高的平均值，則在這種情況下估計的核心家庭數或估計是最大的可能，而以二位已婚兒子推估的是最小的估計值。以最大的估計來看，合計已婚兒子一人和三人的推估，因主幹化形成的核心家戶可以有二九八八個，而非主幹化形成的有二九二六個。至於合計已婚兒子一人和二人的推估，因主幹化形成的核心家庭有一八六二個，而非主幹化形成有二〇七二個。如此推估，我們可以說核心化與主幹化對核心家戶形成的相對分量，大致相等。

誠然，以往的研究大都以家庭形式的變遷當作被解釋的依變項。而多數討論，似乎亦支持家庭核心化為台灣現代化變遷之影響結果。但是對何以擴大家庭理想不復存在，卻未予特別處理。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缺乏長時期的充分資料時，以有限的短短數據去做推論所造成的缺憾。以老年人口居住安排所顯示的核心化趨勢而言，是當前社會學家庭研究的重點之一，但仍有許多面向必須深入探討。目前，所能掌握的只是以一些客觀的鉅視變項，如都市化、人口流動、教育程度、職業背景等，來說明核心化的趨勢與對父母同住狀況或意願的影響。但這種討論都未能將這些變項核心化趨勢或奉養態度，以實際的運作機制串聯起來。我們可以排列許多研究報告中，在說明了各鉅視變項與核心化趨勢的統計關聯之後，必須使用假設性的說明。

例如，當發現農業從業者比較傾向於生活在非核心家庭時，一個方便的推論就是，這樣的關聯可能是農業生活方式的結果，或者是農業環境較少現代化的薰陶（齊力，1990a）。當都市化程度的影響不顯著時，則考慮人

口的城鄉移動、房價與傳統孝道的影響（徐良熙、林忠正，1989）。若發現女性比男性更強的不與子女同住的意願時，則推論說，婦女較受父權家庭的負面影響，在經濟愈來愈可能自立的期望下，所產生的反應（章英華，1993）。徐良熙與林忠正（1989）曾針對人口轉型論者的批評，在更精細的界定家庭形式之後，試圖強化其工業化與核心化關聯的論證。他們特別強調：「社會變遷對家庭結構最直接的影響在於子女及父母雙方對父母同住的看法：在從前的社會，子女長大之後與父母同住，奉養他們，使他們安享晚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現代社會，不但子女成長後喜愛自己自組小家庭，父母也顧慮彼此同住的話，會增加家庭糾紛。」這樣建議正反映著，同住意願之外尚有其他相關的社會規範和態度，必須加以考慮。以上種種假設性的推論，當然都可能引起爭議。但是卻明白指出，對立基於鉅視變項和家庭形式、奉養態度之間的機制與態度，仍必須不斷推敲和進一步系統化分析的。

## (二)從家庭結構到家人關係網絡

有關台灣家庭結構或家庭形式變遷的討論，簡單的說，便是老年父母與已婚子女是否同住的問題。而老年人居住安排就成為研究家庭結構變遷的具體指標（伊慶春、朱瑞玲，1993）。一般而言，同住當然意味著生活的全面性。但是同住未必就等同於人們心中所定義的家庭或家庭生活。就一九六〇年代農村家庭的研究來看，作一個經濟單位的家庭，其財產以及人員是可以分散的，在未分家之前，成員在不同地方的所得，要匯集到家長手中；離家工作的已婚夫婦，在必要時可以很自然的回到母家庭同住同吃（Cohen，1976）。至於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的農業家庭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即使不在同住和共同財產的基礎上，亦有緊密結合的家庭關係，其中又以人類學方面的研究有較重要的成果。例如莊英章（1987）提出的聯邦家庭和吃伙頭家庭，和謝繼昌（1985）所界定的高層次家族等。

聯邦家庭是擴大家庭的一種變形，以一個家長為中心，各個小家庭不必同居共食，但保持緊密的聯繫。在家長的統屬之下，共同參與或負擔地方的社會和宗教活動；在經濟上雖然不是共同運用的，但是卻互通有無。家長的功能主要在協調與聯絡，更是家庭成員之間情感的中心。至於吃伙頭家庭則是年老父母輪流在兒子家中吃飯，有時父母是自有居處，而在用餐時，才到某個兒子的家去。有的情形則是吃住都輪流在諸子的家中。謝繼昌將聯邦與吃伙頭家庭俗稱為高層次家族。他明白指出，高層次家族在今日台灣社會的急遽變遷下有日漸增加的趨勢。由於城鄉遷移和職業分化的緣故，兒子婚後留在家里的情形愈來愈少。因而產生許多「分家」但仍與「本家」有緊密情感與經濟的關係。換言之他們的觀察指出，原來可以形成擴大家庭的各個核心家庭單位，在不同住的情況下，依然維持相當緊密的關係，而可以形成另一種有擴大或主幹家庭之精神，但無共同生活事實之家庭關係。

的確，正統的家戶或家庭的分類，基本上單就居住安排加以分類，而有關台灣家庭結構變遷的討論都侷限在反應兩代同住狀況的改變而已。在擴大家庭戶的概念中，同住一起就蘊含著生產、消費以及財產累積等共同運用的條件。但是在不同住的情況下，這些其他的關係是否就消失了呢？從以上村落研究的結果，意味著高層次家族與聯邦家族只是擴大家庭或主幹家戶的一種替代形式，而生育率長期調查的資料雖然明白呈現出父母獨居情形的增加，但同時也顯示子女寄錢給父母的比率上升的事實。以籍貫而言，外省人與父母同住比率雖較低，但不同住者與父母來往的頻率卻高於其他籍群（孫傳雄，1991；蔡采秀，1992）。一九九〇年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亦顯示（章英華，1993），對父母的居住安排方面，從子女立場明白表示父母應以某種形式與已婚子女或女同住的將近七成五，而從父母立場的在四成五左右；另外對父母生活費的安排，從子女立場明白表示應該以某種形式由子或女分擔的比率高九成，而從父母的立場認為應該由子或女分擔的亦近六成。因此，不

論從實際的行為或態度來看，父母與已婚子女同住的比率與意願變化的情形如何，由於一直缺乏長期有系統的研究，尚待未來研究者的努力，應是值得積極開發的領域。

在目前的家庭型態裡，可以看到好幾類的兩代組合，父母與已婚諸子同住的家族，父母與一位兒子組成的主幹家庭，父母與一位已婚兒子住而其他兒子另組核心家庭，父母與已婚兒子各自組成獨立的家戶，以及只是兄弟關係的核心家戶。目前有關台灣老人生活的研究，亦一再指出老人的主要支持來源是家庭成員，主要照顧方式亦是以在家庭為主（伊慶春、呂玉瑕，1993）。以台灣目前家庭組成的情況，許多值得重視的議題包括：老人和子女同住和不同住是否影響其所得到的家庭支持？若有不同，則子女提供父母服務或支持在同住和分住的情況下，分別以什麼為主？陳肇男（1993）將老年人的支持網絡分成五類：與已婚子女同住而且其他子女經常來訪者，與子女同住者，子女經常來訪者，孫子女、兄弟姐妹、鄰居朋友經常來訪者，以及只有遠親、朋友或鄰居經常來訪者。他的主要發現之一是，對老人日常生活的協助而言，最大的差異是在有子女或無子女之別。他認為這表示，對老人來說，有無子女提供個人日常生活的協助是最重要的考量，其次才是子女是否同住。他再推論說，家戶量的縮小以及父母與子女分居的副作用其實可以避免。他的分析中也顯示，老人對子女情感支持的滿意程度，並不受同住與否的影響。換言之，主幹家庭或父母與子女同住的意義乃在二代間情感和生活協助的功能。如果這功能可以有其他方式代替，同住與否並非影響老人網絡關係的關鍵。此一模式或許亦可相同運用在其他家庭成員關係的研究上。

當然，對台灣當代親人關係網絡的探究，不一定要從傳統以共同祭祀為基礎的家族或宗族開始，也可以從個人所直接觸及的直系和旁系的關係著手。而在中國研究家庭內的人際關係方面，或許可以徐良熙先生所界定的父

子軸的概念為核心（文崇一，1991）。根據父子軸的概念，家人關係中最強的是親子的縱向關係女性則是透過與家庭成員的婚姻關係，而納入的。至於旁系的關係，不僅親密度遠遜於直系關係，更需依靠來維持各種的網絡。從這個起點，我們不妨就已婚的個人較細緻的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夫婦、雙方的父母、其已婚與未婚子女以及孫子，第二層是夫婦雙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子女，再其次是其他的血親與姻親，這些親人與個人的家庭保持如何的互動關係，而這些關係與其他非家人親密關係之間的相對位置和變化的方向，都需要累積長期的觀察資料，才能作有系統的剖析。

談到親子之間的關係，在目前的台灣社會，已不是「同住」一詞所能含蓋。必須從來往的方式、頻率與性質來推敲。即使如此也必須注意，有時某種連繫方式的降低，並不意味實質的變化。比如說，遠地親子之間的連繫，電話已經取代了信件（文崇一，1991）。因此與親人之信件連繫，固然隨著時間遞減，但電話使用卻與日俱增。若我們只以信件往來作為推論的基礎，會以為關係日趨淡薄。但是從電話的使用，卻可以發現關係越來越密切。再從另外一方面來看，頻率的多寡，亦不能直接反映實質的變化。在過去，各種交通或通訊設施相當貧乏，當人遠離居處，在聯繫與交往上頗為困難。像電話與信件的使用，都不是容易的事。那時間，年節時返家便成為一年中最重要的與親子團聚的日子，也是離家者與家聯繫最顯著的方式。因此在考慮人們連繫方式隨著時代的可能變化之後，再以不同的形式的交往頻率交互推敲之後，才能比較正確的對親人間交往關係加以論斷。

此外，還有一些較特別的親人網絡的維持方式，值得考慮。這些方式或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才可能發生，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時期才需要，都不易以單純來往的頻率表現其實質意義。如一對夫婦家庭，在小孩的學前時期，在創業之時，在初次購屋之時、在遇到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或在年老病痛之時，不論在心理上、經濟上與人力上，都需要夫婦家庭以外的協助。在這



些關鍵事件上，親人扮演的角色，和親人網絡關係支持系統有何變化，亦有必要作長期而有系統的觀察。事實上，在個人日常交往模式以及關鍵事件的支持模式方面，釐清親人之間所占的分量與性質，將有助於了解個人、家庭與社會間之關聯的變遷。對核心家庭之外的親屬類型以及來往模式深入探討，不僅是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美國家庭研究的一個轉變（蔡采秀，1988），亦是台灣家庭研究亟待努力的方向。

### 三、小結

上述有關台灣家庭結構變遷的討論中，基本上涉及的乃是傳統的家庭制度在台灣社會的持續與變遷。當學者爭論工業化與家庭核心化的關聯時，意味著傳統的家庭制度與價值已逐漸鬆動。有關這方面的主要論點，我們提出了人口轉型論者與支持家庭核心化者的看法。原則上人口轉型論者認為父母與已婚子女比率仍占多數，表示主幹家庭繼續成為最重要的家庭型式，核心家庭只是主幹化之下的分化產物罷了。至於核心化之支持者則認為，工業化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促使父母與子女都偏好分住；只要條件許可，代間分別建立核心家庭為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們具有具體的數據主張，家庭主幹化與核心化在一九六〇年以後是同時進行者。若是純粹由戶數的觀點來考量，目前台灣核心家庭的比率遠超過其他類型。然而在主幹化及其分化出來的核心家庭的整體概念下（亦即已婚兒子一與父母同住，其他已婚子女各自形成核心家庭）很明顯的，快速的工業化，並未瓦解兩代間的居住關係，尤其由父母的角度加以考量時，這正反映傳統家庭價值與制度的延續。不過以後所要考慮的，仍是影響家庭核心化的因素。在這種探討中，我們必須在鉅視變項與家庭核心化與奉養態度變化之間的意義關聯加以推敲。

另一方面，當討論家庭核心化與家人關係網絡之變異時，一個最值得問的問題就是，因為不同住而形成之核心家庭型態，是否導致親屬關係的淡化。許多家庭的研究都指出，即使不同住，親屬間亦有相當密切的連繫。不論是以父母為中心的互動模式，或是金錢往來，以及奉養父母之態度等等，皆顯示代間緊密聯繫之事實。而針對老人生活的研究更指出，有與沒有子女協助老人日常生活之需要比是否同住更顯著影響老人的感受。

固然親人關係網絡可以超越同住的界線，而且家人間不同方式的交往也被視為當前社會生活型態之調整方式，但是不可否認的，對於我們傳統上以父子軸為中心的家庭制度而言，要深入剖析家庭結構和家人關係網絡之連結，恐怕首先要考慮家庭成員之親疏程度。因此我們提出了以血緣關係所建構的三個網絡層次，建議觀察這三個層次之間，以及它們與三層次以外的人際關係間，在方式、頻率、與特殊需要的相互支持等所顯示的差異。如果能嘗試之基於親屬網絡之分類方式來探討家庭結構與家人關係的變遷，或許對釐清此二試題關聯性，可以有積極的貢獻。

註：本文係依據作者論文「台灣的家庭研究：鉅視與微視之間」的前半刪節而成，論文發表於中研院民族所舉辦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瞻」第二次科際研討會（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二至十四日）。刪節部分亦於內政部主辦、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執行之「家庭如何因應社會變遷研討會」中宣讀。本文撰寫蒙中研院社科所伊慶春教授修訂，特此致謝。

（本文作者現任中研院民族所教授）